

董仲舒 教育思想 研究

张鸣岐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董仲舒教育思想研究

张鸣岐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董仲舒教育思想研究/张鸣岐著.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ISBN 7-107-13203-2

I. 董…

II. 张…

III. 董仲舒-封建主义教育思想-研究

IV. G40-09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0387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编: 100009)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市房山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4.25

字数: 106 千字 印数: 0 001 ~ 1 600 册

定价: 8.40 元

序 言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汉代的董仲舒是一个在教育思想、政策及实施上起作用的和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一位教育家。他处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正当汉王朝要求大一统和开拓的兴革之际，在政治上要求改革汉兴以来所采取的“执道任法”的方针路线，在思想学术上要求结束“百家殊方”“所由异术”的局面，在教育上要求调整只靠自发的私人设学和扩展历史的官府学吏制度与察举等。董仲舒适应这种历史转折的时代要求，作为一个具有卓见的思想家、改革家和名儒大师，提出了新的政治、学术指导思想的“独尊儒术”的学说主张，同时拟制了与之相应的以儒学为宗旨的封建国家教育建设工程。因此在历史上他被称为“汉代孔子”，这虽然是封建的尊号而且也有溢美之处，但也说明了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董仲舒继承、发扬传统儒学，吸取当时各家学说中有利于统治及现实需要的部分思想主张，从而改铸了先秦儒学而构制成汉代新儒学，强调“经世致用”，为维护与强化封建统治秩序提供并推行了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论，谋划并实施了儒学的教育方案。可以说，他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奠定了基础。其教育理论与设施，在历史实践中积累为我国教育上的遗产，曾在一定时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深远的消极影响和毒害。对董仲舒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分析和评价，对我国教育遗产进行清理，是我们教育史工作者的任务。特别是由于董仲舒教育理论有复杂的历史作用，就更需要进行比较详细、深入和全面的探讨。

我们要继承我国自古以来的珍贵的教育遗产，就必须用马克思

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总的历史情况来看，董仲舒顺应历史潮流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教育上作出了某些创新，同时也表现出相当的师德与师才，教育有方，培养出了许多人才。这些可以说是在教育史上的贡献，是应予肯定的。我们不能因为他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就否定他在教育上所作出的一些成就。我们要坚持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进行全面研究，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讨论董仲舒教育体系中的精华部分，也必须剔除其封建的唯心的糟粕，而且必须彻底批判和肃清其流毒。我们要去伪存真，使古为今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而探讨我国固有的丰富的教育遗产中的这一智慧资源，总结经验教训，并探索规律性的东西，以资借鉴和参考。

基于上述情况，我写出《董仲舒教育思想研究》，这是我任教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多年体验和感受，是我研习了现代史学界、哲学界专家和教育学者们有关的科研成果所得到的启发。教育史虽是一门相当独立的专业史，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还是密切的和广泛的，在一定范围上可以说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因此研究本书的课题，就不能独守在所属的教育史门户之内闭门自修，必须学习、了解其他有关学科，要作开放性、包容性的研究，当然主要是进行本学科独立特性的探讨，以阐发教育史中教育思想的特点。本书力求陈述应有的翔实史料，作必要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从中找出问题，进行分析、概括与评议。董仲舒在教育史上不是独自一人个人活动的，他的教育思想也不是无原委无基础地随心所欲地油然而生。他是一定条件下的历史人物、社会角色，从事于一定社会关系和地位的教育活动。从纵的方面看，在时间上他上有渊源，有所继承和发展，下有流传和影响。从横的方面看，在空间上他有同当时当地情景密切相联的作为和作用。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充分表现着论是有所为而论，行是有所为而行，在人际间有调谐有对话，有交锋与挑战。我们对其教育言行的成就与弊端、积极与消极作用及其一生功

过，要作全面衡量，同时也应注意到他比其先辈有所落后的和比较正确的新生的东西，要看到这些差异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力求作出比较科学的公正的述评。对此，本书针对具体问题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这种做法是否得当，尚待商榷。特别是其中一些分析与评估，限于作者的理论、业务水平不足，必会有若干不当以至错误之处，谨请专家们读者们斧正一切。这也就使拙作得到“抛砖引玉”之效。

在本书撰著过程中，我的师长、著名社会学家、现任我们燕京大学校友会会长的雷洁琼教授特拨冗指点；华东师范大学李国钧教授、吉林教育出版社综合室主任郑长利先生、河北省景县文化馆王立泉先生等给予了帮助；人民教育出版社及该社副总编吕达博士始终不渝地重视扶持教育学术著作出版；责任编辑刘立德硕士为书稿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付出了辛勤劳动；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还有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的一些老师与毕诚、于龙、王岚、潘莉娟、季苹等。在此，谨一并致谢！

张鸣岐

志于北京师范大学寒舍

1999年2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董仲舒的生平及其修学与教育活动	(1)
第一节 早年的从学和授徒	(2)
第二节 中年的从政和执教	(4)
第三节 晚年的著书和传道	(13)
第二章 董仲舒的教育政策思想及其实施	(19)
第一节 尊崇儒学以统一思想的教育宗旨	(20)
第二节 设太学以养士、行贡举以选士的教育兴革	(28)
第三节 兴“教化”以“化民”的社会教育	(38)
第三章 论人性与教育	(43)
第一节 性三品与“中民之性”善恶二端	(43)
第二节 人性的发展与教育的作用及其政治意义	(53)
第四章 关于纲常的道德教育及其教育原则方法	(63)
第一节 “三纲”“五常”的道德教育	(63)
第二节 道德教育原则方法与修养	(90)
第五章 论教学与教师	(104)
第一节 论教材与教学原则方法	(104)
第二节 论教师	(117)

附录一：董子祠堂记（元·曹元用）	（ 121 ）
附录二：董子书院记（明·李东阳）	（ 123 ）
附录三：董仲舒事略及时事年表	（ 125 ）

第

一

章

董仲舒的生平及其 修学与教育活动

公元前3世纪初，汉王朝取代秦朝的统治，建立起新的封建帝国。它鉴于秦末农民起义的力量，并汲取秦朝严刑暴敛以致败亡的教训，遂采取了一定“无为”的策略，实行了一些“生养休息”的措施，因而安抚了民心，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力，取得一定的经济好转和政治稳定的局面。汉王朝表现出封建社会上升和前进的趋势，从建立政权统一国家之时起，力求改革以巩固和发展其封建秩序。在此形势下，先后有许多博学并怀持政见的儒者，相继挺身而出向汉天子出谋献策，倡议以儒术治天下。如在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时，陆贾力陈文武并用，行仁义，法先王；叔孙通依据儒礼为汉王朝制定朝仪。至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数奏陈政事疏，强调摒除亡秦虐政而兴仁义，^①等等。迄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即位，胸怀宏图大略，努力于除旧布新以求进一步开拓封建事业，急切强化皇权以求加强统一与维护其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在这样的要求下，董仲舒作为整个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便应运而生。他是具有卓见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极力宣扬儒术而负有盛名的有巨大影响的政治家、教育家。他十分详备地阐发了儒家的封建思想理论和政治伦理观，对于封建文教工作提

^① 陆贾、叔孙通、贾谊事迹，见《汉书》中各该本传。

出了一整套的设计方案。他成为具有深邃思想和政治抱负的名儒大师。可以说,在一定意义和范围上,董仲舒堪称汉代封建政治与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改革家。

董仲舒,汉代广川(在今河北省景县境内)人,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中经汉景帝,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去世。^①

第一节 早年的从学和授徒

董仲舒自少年至中年以前,努力求学并开始教育活动。

他出生的家庭富有田园、牛马和藏书,这使他在早年就享有优越的求学条件。同时,自汉兴以来,朝廷日渐重视和察举负有德望和博学之士,任以官职而为汉王朝进行“建国君民”的工作。这就促使董仲舒怀持封建政治抱负而勤奋修学。他在家庭教育和就学于当时儒师的私人教学下,刻苦学习,精心读书,以“三年不窥园”^②的闭门钻研精神攻治儒家典籍,兼习先秦其他名家学说。

董仲舒治学着重研究儒家法典《春秋》,特别探讨以申明《春秋》微言大义而成为当时显学的《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或称《公羊春秋》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专门阐释儒家典籍《春秋》大义的一种撰作,最初没有成书,只是口说传授于世。至汉景帝时,由公羊寿和胡毋生“著于竹帛”而成书。在汉初,儒者为适应汉王朝要求中央集权、抑制诸侯王的骄纵而得天下统一安定的要求,遂

① 多数学者考订董仲舒生卒年为公元前179—前104年。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历史人物辞典》载“董仲舒(前180—前115年)”。可资参考。

② 《汉书·董仲舒传》。以下凡引此传,均不再注。

宣扬《春秋》大一统、尊君等思想，其中结合一些天人相通、君权神授与阳尊阴卑的神秘学说，以加强《公羊春秋》学说的优势及其支持汉王朝政治要求的力量。由此得到汉王朝的重视。在当时，董仲舒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公羊春秋》学说的代表人物。他以儒学为基本思想，吸取阴阳五行和法家等思想，把先秦的原始儒学塑造成适合汉朝封建统治要求的汉代新儒学，即以儒学的王道、仁义政治伦理思想为主体，而贯彻神秘的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之说，并阐发礼法结合的主张。例如，他把天意、阴阳之说附会到公羊学中，以阐发他关于《春秋》的思想理论。在他的著述中，鲜明地讲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故圣者法天”；^①“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意是施行“阳尊阴卑”的，故“务德而不务刑”。^②又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③君、父、夫为阳而贵，臣、子、妇为阴而卑。总之，董仲舒主张《春秋》的要旨，在于“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万民之欲……正是非，见王心”。^④他特别以天道、阴阳之说阐述奉天、尊君、正名、正道一统的思想理论。

关于董仲舒的治学及其专精之处，在当时曾向董仲舒问学求业的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6年）明确地讲道：董仲舒申述《春秋》之义在于“达王事”；^⑤还指出：“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⑥又说他“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特别指出董仲

① 《春秋繁露·楚庄王》。以下凡引此书中文文章，不注书名，只注篇名。这里所引《繁露》各篇，并非董仲舒早年的著作。但其中思想是在早年修学形成的。

② 《阳尊阴卑》

③ 《基义》

④ 《俞序》

⑤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⑥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①至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则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②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董仲舒在中、青年之际，成为当时学问渊博、兼通五经、尤擅《公羊春秋》的专家，致使“学士皆师尊之”。由此，他收授门徒很多，即开始教育生涯，进行“传经行道”，为汉王朝培养统治人才。应该看到，董仲舒作为卓越的教育家，不仅是一位授业解惑的经师，还是一位培养德能兼具、通经致用之才的人师。还应看到，自春秋时期官学失守以来，迄至汉王朝建立官学制度，在社会上教育得能维系，学术得能传递，人才得能培养，除了皇室、公卿等贵族官僚及名门对其子弟特设师、傅及进行家教外，主要依赖于私人设学授徒和民间的家传世业。董仲舒也就是从庭训和受业于当时私人讲学之门而成长起来的。由此，他在自己学成业就后，遂亦从事于私人的教育活动。他收徒众多，不能一一亲授，就使学习年久和学业有成的高徒代为教授新来的弟子，以致有些弟子对他是“莫见其面”的。

第二节 中年的从政和执教

董仲舒在中年时期，登上了仕途，积极为汉王朝实现封建大一统事业出谋划策，提出“改制”“独尊儒术”与“推行教化”等主张。

他在年过30岁时，因专精《春秋》，于汉景帝时被任为博士。当时有和他同治《公羊春秋》的齐人胡毋生也被任为博士。博士是沿袭战国后期至秦朝的一种官职，其主要职务是“掌通古今”，博

① 《史记·儒林列传》。以下引此，简称《儒林列传》。

② 《汉书·五行志上》。

览群籍而参与议论国家政事、祭祀及各种礼制等，以供皇帝咨询历史故事、政治问题和诸家学问的一种顾问之官。当时的博士们在学术掌握上虽相当广泛和复杂但各有专精，有精通儒学的，有精通其他诸子学说的。史籍所载，早在秦代的“博士官所职”，就有“《诗》《书》、百家语者”。在汉朝初立迄于文、景之时，封建政府为了稳定政局和恢复生产，采取道家中尊奉黄帝、老子的黄老学派所倡导的清静无为与刑名之学作为政治主导思想。然而自汉兴以来，诸儒“得修其经艺”，汉高祖任用儒者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惠帝以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之弟孔子襄为博士；文帝使故秦博士伏生授《尚书》，遣原学申、商刑名的晁错从治《尚书》而诏为博士；景帝以轅固生为《诗》博士，以胡毋生、董仲舒为《春秋》博士，等等。这说明在汉代初期，封建王朝日渐看到儒学维护其统治的作用，并设立儒者专精一经的博士。可以说自秦以来，所任的博士是杂有各家学派的，但以儒者占多数并据有相当的力量。至汉代初期以黄老之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情况下，儒家尽力多方表现出其学说有维护封建秩序的效能，但也只能作为当时统治思想的一项补充或一个辅助部分，却还不能占统治地位，儒学博士也得不到重用。

当董仲舒被任为博士登上仕途时，正当“景帝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这里主要指儒学博士而言——笔者）具官待问，未有进者”。^① 所以，董仲舒虽已为博士官，然不任事，无任何权位。博士官只是一种仅供天子咨询的闲散官职。因此，他可以在任官时还能随意收徒讲学。这不独是董仲舒如此，当时的其他博士以及许多担当其他官职的学者也大都从事私人讲学授徒的活动。这种任官修学和亦官亦教的情况，可以说是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游宦授徒和“仕而优则学”的一种可取的历史实践与思想

^① 《儒林列传》。

传统；也可以说是延续了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士“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①并广收弟子而授学的一种具有发展学术与教育事业意义的遗风。在这里需要指出，在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诏令太常等讲议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前，董仲舒等博士的收徒讲学，并非官方所规定的教育职责，而只是私人招收弟子的教育活动。

董仲舒在政治和教育活动上发挥其才能与作用，以及使儒学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我们知道，西汉王朝至汉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之时，经过前期采用黄老之术，进行六十余年休养生息的经营，政治已相当地稳固，生产已取得一定的发展。这说明道家的清静无为之术在汉朝统治初定时期，即在汉初“接秦之弊”国困民贫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使封建政府注意减缓苛政繁赋，而采取省刑薄敛的政策，收到了汉朝统治者所企图的积极效果。黄老之术在汉初有利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人民带来某种安宁。然而要知道，汉王朝执行黄老思想，在主静之中还是贯彻着刑罚的，是“执道任法”和实行“无为而无不为”的。如贾谊指评汉文帝时说：“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为法若此，上何赖焉？”^②至景帝时，还是“酷吏犹以为威”，^③等等。汉王朝实际上是德刑兼施与动静并行的。这也就反映出西汉初期的封建统治虽然取得了安定休养的成就，但仍然存在着封建阶级的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至汉武帝时期仍有侯王封国的割据，发生豪强大贾的兼并，面临着匈奴南下的威胁，特别是还有农民的贫困与起义的危机，等等。同时在思想意识领域中还存在着“百家争鸣”的情况。虽然是采取黄

①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② 《汉书·食货志下》。

③ 《汉书·刑法志》。

老学说作为政治指导思想，但人各异说，进行着各派学说的争论（详见第二章有关论述）。这一切使汉朝的国家统一、中央集权以及政治统治思想等不够牢固和坚强，因而需要采取新的措施以解决问题来维护汉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原来采用的黄老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就显得因循保守，无所作为，而不能适应汉朝兴革有为的要求。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要变静为动，改苟且迁就为大有作为，化保守为进取，体现着封建社会及其王朝的上升和前进的趋势。这就需要谋求相应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取代已经完成汉初历史任务的黄老学说，同时广征人才作为汉朝革故鼎新的栋梁。当时的历史进展正是如此。在思想意识方面，儒学的损益、有为、礼义之旨与尊王、正名和一统的精神，日益显示其满足封建社会制度的发展与汉王朝的需求，因而日益受到重视；在人才方面，儒者纷纷宣扬其治国平天下之道，积极献计献策显示其才能，遂日益为汉王朝所器重而予征召或察举为博士与贤良方正等，^①并日渐加以重用。董仲舒以博学和精于《公羊春秋》作为当时儒家学派和儒学人才的一个代表人物，被汉景帝征为博士，这表明汉兴以来日益对儒学的认识和引用儒者的取向。汉武帝为了改进封建统治与强化中央集权而崇尚儒术，遂沿袭自汉以来选拔贤良方正的故事，大行诏举贤良文学等，作为加强汉代国家统治机制与进行兴革之资。对此，史书载明，自汉兴迄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即汉武帝即位之时，“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义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向）儒术，招贤良”，^②“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③由皇帝

① 汉王朝选拔统治人才的一种科目。汉天子依其需要随时诏令公卿郡国从任职官吏及未仕之士中察举具有相应德才的人，经皇帝亲行策问，中选者便得擢用或升迁。

② 《史记·孝武本纪》。

③ 《汉书·武帝纪》。

亲予策问。就在这时，“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①董仲舒以儒学博士之官的身分被荐举为贤良之士，接受汉武帝的亲自策问。他斥责法家等说而尊崇儒术，特别是基于《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逐一地回答了汉武帝所询问的关于治平国家的思想理论和方略等问题的三个策问。他以天道、阴阳之说，阐述了关于灾异符瑞与天人感应及巩固太平盛世的问题，实即宣扬君权神授和维护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尊君、正名的思想理论；说明了奉天命、改制度与去安逸而行强勉的“更化”之道，以及省刑重德、去酷吏而任贤吏的王道仁政之治；阐发了《春秋》大一统的精神，使儒学作为统治思想以加强封建王国的统一。董仲舒在他的全部对策中，申述了他的思想理论和政治兴革的仁政主张，向汉武帝提出了为治国兴邦而大行教化的教育方针和办法。他的这个对策在历史上被称为“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完全适合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大兴、统一图强和力求封建秩序绝对化、君权神圣化的意愿，因而汉武帝称董仲舒是“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到东汉时期，卓越的地主阶级唯物主义思想家、儒学大师和教育家王充（公元27—约97年）虽然批评天人感应与符瑞灾异之说，但在政论上还是称道：“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②

董仲舒在对策中极力表示拥护当朝的君主，十分歌颂与寄希望

① 关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天人三策”）年代，有建元元年、建元五年、元光元年和元朔五年等说法，各有其论证，但均可商榷，作进一步的考校。这里采取最为流行的建元元年说。《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期载岳庆平《董仲舒对策年代辨》一文，论证对策年代为元光元年五月。这很值得参考。但岳文也认为董仲舒在建元元年对过策，只是其策文非如《汉书》本传中所载者，但已表达出若干相同的思想。

② 王充《论衡·佚文篇》。

于汉武帝。他称道：“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谊（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义）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十分明显，如此的君问臣答、君称臣颂极相契合，绝非偶然，而是表明了双方站在同一立场和有着同一要求，必然具有同一宇宙观、思想意识和政治主张。

在这次察举贤良中，当时崇尚儒学的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①立即得到了汉武帝的同意。但当时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②武帝虽赞同丞相的奏陈和董仲舒的对策，却难于立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便马上擢升董仲舒的官职。董仲舒先后所得的博士与贤良都是无任何实职、实权的，但按职责能经常接近皇帝，献言献计；遇有机会可以得到皇帝的重用，外迁则可为郡国的相、傅，内迁则为朝廷的公、卿等。至建元初年，董仲舒被派为武帝的哥哥（异母兄长）江都王国易王刘非的国相，以后又调迁为胶西王国于王刘端（刘非的异母兄弟）的国相。可以看出，董仲舒之被察举贤良和受任王相，标志着儒学思想为汉王朝所重视和采纳，同时表明董仲舒在封建政坛上已发挥其作用。汉代诸侯王国的相职虽无朝廷公卿之尊，却多是为皇帝所赏识、信用而被遣往宗室王国监辅王政的特派员。这在官职权位上和政治作用上远远高于博士、贤良等职。当时董仲舒就是以这种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和名师大儒的声望，先后到江都和胶西王国为相，分别受到易王的“敬重”和于王的“善待”。

董仲舒在先后两相王国时，尽力倡行他的政治抱负，阐扬他的思想政治主张，对两王都是说以仁政，匡以礼义，并“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注意生产与关心民生。如任江都相时，

① 《汉书·武帝纪》。

② 《史记·孝武本纪》。